

《热风》与鲁迅的“新文化运动”〔*〕

王本朝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热风》是鲁迅声援《新青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当《新青年》正处“四面受敌之中”,鲁迅决然毅然以“随感录”方式发声,从新文化运动边缘来到中心,虽不免有些自说自话,但却担负起攻击时弊,排除疮痍之责,冷嘲热讽一切变革中的守旧派和嘲骂者。《热风》既呈现了鲁迅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命题,也表达了鲁迅的人生哲学。它对新旧混杂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好古、排外而又自大的国民性的揭示,对循环人生的抗争以及不断向上走的意志追求,都显示了鲁迅独特的生存体验和思维眼光,为推动现代社会和思想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鲁迅;现实真相;人生体验;新文化运动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03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和参与者,但他拥有自己的思想命题和话语方式。小说集《呐喊》是一种方式,杂文集《热风》也是一种方式。完全可以将它们对读,相互印证,共同呈现鲁迅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的文学想象与思想创造。《热风》主要收入鲁迅1918年至1924年间所作杂文41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它主要表现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寒冽”的社会“空气”和“病菌”的“感受和反应”,并以“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批判一切守旧派的嘲骂和自恋,声援《新青年》,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鲁迅在《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他并“没有写什么文字”,“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消失

消灭的了”,因为“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如同“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曾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1〕}新文化运动先被反对者们所讥笑和嘲骂,后又反对者将自封的称号赐予《新青年》。“新”与“旧”都不过是帽子戏法,缺乏实际的内涵和意义。鲁迅并不热衷于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或口号之争,而是关注新文化运动时期实实在在的社会真相和文化本相。事实上,从《新青年》创刊的

作者简介:王本朝(1965—),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批准号:11AZD064)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创新团队项目“思想启蒙、社会改造与审美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论”(批准号:SWU1709102)的阶段性成果。

1915 到 1917 年,鲁迅并不十分热心,也很少写文章,而是在“S 会馆”“槐树下”“钞古碑”,消磨掉“生命”的热情,“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2]但是,当《新青年》处于“四面受敌之中”时,他却站了出来,写作了小说集《呐喊》和杂文集《热风》。《热风》以“随感录”方式,针砭时弊,冷嘲热讽,“对付”《新青年》敌手中的“一小部分”,^[3]意在分担《新青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为青年们的抗争和前行,提供新的人生哲学,这或许也是《热风》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一、新旧杂存:复古守旧的巢穴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态是新旧混杂的。它将什么东西都“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接踵的存在”。新与旧,西洋与传统,现代技术与古老技艺,凡此种种都“挤在一处”,如同“拼开饭店一般”,虽“竭力调和”,但也“只能煮个半熟”。^[4]并且,“无论新的旧的,都各各起哄”。^[5]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一切人都在矛盾中间”,还互相怨怼,互相撒台,谁都别想得到任何好处,生意“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6]人的生活 and 思想也是如此,“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既自己想活着,又“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本来想“折中”,因为做不到,最后“连生命都牺牲了”。即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时制宜,折衷至当”,都不过是“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而已。

维新成了皮毛,只是想“关门”作梦,但“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其结局自然是“愈挤愈苦”。^[7]

实际上,混杂、折中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还是复古和守旧,为了保存国粹。“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那什么叫“国粹”呢?“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鲁迅却认为,“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8]“国粹”在于特别,特别却未必好,因为“特别”可能是一种病。那么,“特别”也要有合理性,要合乎一般人的生存和发展。即使要“保存国粹”,也须追问“国粹”是否“能保存我们”,这才是“第一义”的,所以,如要保存国粹,须先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9]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连“我们”都不存在了,“国粹”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就是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值得保护和承传的前提条件,它是否具备让“我们”活下去,还活得好,能发展的可能性。连“我们”自己都消失了,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国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鲁迅对此和许多人一样有了大恐惧,他担心“‘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10]如果我们只知道国粹,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守护所谓最“特别”的东西,而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中国人也是世界人,那么,中国人的名目反而就消失了。鲁迅的担心和害怕出自这样的逻辑,在他看来,“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而偏爱“国粹”的国民,却只“劳力费心”他们的国粹,“粹太多,便太特别”,自然也就不能与他人“协同生长”,最终也挣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中国社会却有人主张:“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中国人”身份成了挡箭牌，成了护身符，成了守旧的巢穴，这让鲁迅更感忧虑和恐惧，有了更大的绝望和悲哀：“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11]鲁迅担心中国只是这个“世界”的暂住者，如果不改革，不变化，就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让中国成为世界人，这也是鲁迅的社会理想。在鲁迅那里，“世界人”并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思想文化观念，相对于落后而封闭的中国而言，它是进步的，开放的，它肯定了中国与世界拥有共同命运，应协同生长，才能为民族国家挣得地位，世界人与中国人是统一的。在五四这个新旧杂陈实为复古守旧的时代，鲁迅的世界人意识实际上就是开放意识和变革意识。

鲁迅对新旧交替之际复古思潮的不断涌现，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即使是被包装的新事物，实际上也是换汤不换药。如自称“新艺术”的中国美术，却并非是“真艺术”，他们“心盲目”，口里说新艺术真艺术，以为自己“懂得这新艺术真艺术的了”，但“所画的讽刺画”，却“是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的”。^[12]所谓新艺术和真艺术不过是幌子而已。又如有“竭力提倡打拳”者，称其为“新武术”和“中国式体操”，可达“枪炮打不进”的效果，并希望普及到教育和体育上，但鲁迅却认为它终将有与义和团一样的“完全失败”的结局。^[13]那么，为什么人们喜爱复古呢？一是守旧崇古的传统作祟。“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是无名的肿毒，若生在了中国人身上，也会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若是国粹更“妙不可言”。哪怕是公认的“学理法理”，因是“洋货”，也自然“不在话下了”，^[14]不值一提。所以，“与众不同的中国”，就“不是理想的住家”。^[15]只往身后看，不往前走，哪还有理想的位置？也会阻挠新事物的出现，连提倡多年的白话文，虽然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也落入“不值一哂”^[16]的境地。他们千方百计地好古，想回到远古去，“现在的人

心，实在古得很”，“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 Vedda 族。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斯里兰卡的 Vedda 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狩猎生活，保存着母系社会的习俗和万物有灵的信仰，但却面临即将灭绝的事实，这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它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17]二是合群的自大。中国人不吸纳“新空气”，适应“新潮流”，而又“合群的自大”。他们向来“有点自大”，但不是“个人的自大”，而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是特立独行，敢于向“庸众宣战”，它的“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18]“个人自大”能创造新思想，带来社会变革，但因其愤世嫉俗和厌世，容易招人怨恨，为社会世俗所不容，但它始终是新思想的发明者，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改革家。所以，鲁迅说，拥有“个人的自大”的国民是有“福气”的，是“幸运”的民族。^[19]“合群的自大”和“爱国的自大”的民族却恰恰相反，它们“党同伐异”，向“少数的天才宣战”，他们虽然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却喜欢“夸示于人”，“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躲在自大的“影子”里，以有“国粹”为荣，相信国粹的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外人攻击，他们也不敢去应战，而是“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一阵乱噪”，以为这样“便可制胜”，如果“胜了”，就说“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他们喜欢“聚众滋事”，“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其结果必须是“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鲁迅对这样的情形，早“已领教得多了”，所以，他才感到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20]“合群”是卑怯胆小，“自大”也不过是“蹲在影子里”，一旦面临现实困境，就只好去寻

老例,“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21]由此可见,中国人心理的孱弱和人性的荒芜。

二、完结旧账:向上进化的路

鲁迅将迷恋国粹和复古称之为“现在的屠杀者”,他们虽做了人类却想成神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喜爱“僵死的语言”,这样,“侮蔑尽现在”,成了“现在的屠杀者”。在鲁迅看来,如果“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自然也就没有子孙,因为“将来是子孙的时代”。^[22]对复古守旧者,“现在的屠杀者”是一个非常精准而形象的概括,他们“一个劲儿地守住过去”,“好古而排外”,喜欢夸耀自己,说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而西方呢,再好也是不被承认的。在他们眼里,西方“物质文明虽高”,但中国“精神文明更好”;或者说“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包括科学,中国传统诸子百家也有科学;或者是换一种说法,“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总之,中国什么都比外国的好,哪怕是种种野蛮不进化的现象,也认为是好的。^[23]于是,中国社会到处充满了种种野蛮景象,如“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鲁迅称这样的情形为“土人”特点,“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性”。^[24]因为好古、守旧且排外,变得封闭,变得不进步,自然也就“扼杀了将来”,因为它“忽略了现在”。“现在”是“过去”通向“将来”的桥梁,没有“现在”,“将来”也就不可能;没有“现在”,“过去”也就没有了意义。鲁迅始终是“现在”的体验者,是“现在”的承担者,有了“现在”也就会有将来。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这是一条

进化的路。但中国社会却走着循环轮回之路,中国的人生也形如转圈,“孩子”成不了“人”,“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甚至还不如他们的父辈。^[25]无论是“穷”还是“富”,是做“父亲”还是“儿子”,孩子只是父母福气的“材料”和工具,他们被生下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26]父母们“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管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27]这样,他们的人生就成了“昏天黑地”在那里“转”圈,“在尘土中辗转”,原地踏步而重复,实现一个又一个如同他们父辈一样的轮回。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长大了,自然“也做不了人”。^[28]于是,鲁迅希望国人不能只管生,不管养,只作“孩子之父”,不作“‘人’之父”;只知道“制造孩子”,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人’的萌芽”。^[29]鲁迅希望要把孩子当人看,“解放了我们的孩子!”^[30]不希望孩子重复父辈的路,这实与小说《狂人日记》有着相近的立意。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在鲁迅这里,就要完结旧账,懂得爱,并给予爱。鲁迅的总体感觉是,做中国人是有些可怜的,从小到大,既没有得到过“爱”,也没有去爱过人,到了成年以后,自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了。他们好像“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父母安排他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一男多女——的住着”。女的呢?“做了旧习惯的牺牲”,男的也“陪着做一世牺牲”,不敢有任何“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只不过他却“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如果有人能发出“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感叹,鲁迅反而感觉到有了“血的蒸气”,因为它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有了呼叫声,说明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所以才能“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31]于是,鲁迅希望人们能大喊“大叫”,“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

哀”，直至“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32]“叫唤”也是对现实和自我的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它“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正是因为“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所以，这个民族才能“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如果“只知责人”而“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恰恰会面临“祸哉”的可能。^[33]鲁迅将“没有爱”和“无可可爱”看作是人生觉醒后的悲哀，这既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不无他个人的体验，还有《彷徨》中《孤独者》《在酒楼上》和《伤逝》的情绪写照。

带着“不满”和“希望”向上走，也许他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路，也许还将面临人生中的冷笑和冷箭，但都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恨恨而死。这也是鲁迅所期待的“真实人生”。他从江苏方言“数麻石片”和四川方言“洗煤炭”里感受到，中国人喜欢当看客，失败了有些自暴自弃，“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如果与过去的积习不抵触，“才有立足的处所”，并被恭维得像“烙铁一般热”，否则，就免不了被冠上“标新立异的罪名”，或者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样的社会环境和习惯，很容易让那些“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不敢贸然前行而畏畏缩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要么“专谋”“成功的经营”，要么发出“冷笑”。^[34]这样，中国人有的在“冷笑”里“成功”了，有的则“萎缩腐败，以至老死”。鲁迅希望中国青年“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应“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如同“萤火一般”，“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即便以后“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一点不平之心，而且还要赞美“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亮了人类，包括自己也受到了光的照射。^[35]以上这些文字，常被人们作为鲁迅精神和哲学的名言警句，特别是“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它们生动地表现了鲁迅的献身精神和责

任意识。其实，最能表达鲁迅最为独特的人生哲学，应该是这一句，即使世界没有“炬火”的“光”，“我便是唯一的光”，这也便是鲁迅的“暗夜行走”的生存方式和行走哲学。在五四时期，鲁迅的人生哲学不同于郭沫若，他说，即使世界没有光，我也要在黑暗里走。郭沫若的人生哲学则是“我是世界的光，请你跟我走”。《野草》和《女神》就显示了他们不同的人生体验。《热风》也有鲁迅的人生观在里面。

个人不但要不断往上走，而且还要融入和参与种族的绵延和生长。这里有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进化论”是鲁迅反传统、反国粹的思想武器，他把种族和社会看作是新老交替，不断进化的过程，“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36]且不说，这样的理想是否符合社会历史，但鲁迅的确描绘出了一幅生动有趣的进化之路。一个又一个从生到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前行者走不动了就让道，还自觉地填平深渊，让新来者欢天喜地行走在“开阔”的大路上。这样的画面有些完美化，带有鲁迅想象的理想主义倾向。每个人都想到他人，都为他人去做事，这样的话，人就有了开阔的路。与之相反，猴子却被看作不进化的形象，他们“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甚至“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即使有了几匹，还是“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而被“咬死了”，

最终也没有“进化”掉。^[37]鲁迅相信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与猴子之间存在进化的链条,人因为进化才成了人,猴子因为不进化,才始终是猴子,还被人看,成了不进化的笑话。当然,鲁迅的进化论也不完全止于生物学意义,且具有精神价值向度。

三、声援《新青年》:人生真相与自我反思

鲁迅曾说《呐喊》是“听将令”的写作,^[38]是“遵命文学”,“遵奉”了“前驱者的命令”。^[39]于是,取有与《新青年》相近的思想启蒙立场。但《热风》里的鲁迅却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也不是指指点点的旁观者,而是社会现实的感受者和体验者,是自我存在的思考者,他把自己也放在了里面,拥有强烈的人生体验和反省意识。《热风》“题记”一开篇所提及的并非是文章的事,而是所面临的严酷的社会现实。他说:“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鲁迅注意到了卖报纸小孩衣着的变化,从“体面”的“制服”到“衣履破碎”,他们在“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由此可见其“年不如年地”堕入了“穷苦”。^[40]生活虽然日渐凄苦,但“周围的空气”却依然是那么“寒冽”,所以他将这些文字称之为“热风”,用一股“热风”去对抗或者说逼退凛冽的“寒风”,这也是鲁迅写作《热风》的现实意图。

在《热风》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语词是“现在”和“近来”。如“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现在许多人大有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什么感”;“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等。

“现在”和“近来”都是时间限定词,它们所指既是当下的社会现实,又有个人经验。它不同于书斋生活的认知,也有别于理论逻辑的推演,更没有利益关联的输送,所表达的是鲁迅自己感受最为真切的现实真相和急需变革的社会现状。当然,也不无鲁迅的压抑和倔强。在“题记”里,鲁迅用自嘲口吻表达了他的反抗,他一贯是希望这些“应时的浅薄的文字”,应该被“置之不顾”,任其消亡,“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鲁迅并不感到十分高兴,而觉得“这正是我所悲哀的”,因为在他看来,“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如同长在人身体上的疮疖一样,如果它没被完全排除掉,即使身体里有些许残留,也证明它的“病菌”还存在。^[41]“悲哀”是鲁迅人生辞典里的常用语,它既是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也是鲁迅个人的存在状态。《热风》的“悲哀”不仅表现为鲁迅愤激的文字,而且敞露了社会真相及其生存方式。

《热风》主要是批判传统和时弊,但也有自我反思。人们常在《呐喊》《彷徨》和《野草》里看到鲁迅无情地解剖自己,实际上,自我反思和批判贯穿了鲁迅所有的文体样式。鲁迅的行文常是一行文字一条鞭痕,抽打着社会历史,也抽打在自己身上。鲁迅在《热风》里惯常使用“我们”这个语词,显然是包含自己在内。他说:“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

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42]对这段话,如稍作统计,会发现“我们”出现了4次,还有“中国”和“祖先”,所指对象实是相近的,“我”出现了2次。可见,鲁迅说话的角度和立场始终把自己包含在里面,因为“昏乱的人”也在“祖先里面”,所以我们就“不由自主”被遗传。遗传不自觉,改变却应有意为之。要改变“祖传”,只有“科学”,只有进化,并且,“从现代起,立意改变”,坚持下去,“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不能只停留在“不平和愤恨”,“不平”只是“改造的引线”,还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而“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43]于是,鲁迅发出了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相似的呼吁:“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44]

变革先从自己做起,寻找新的生命之路。人的生命既是自然现象,有其必然性,也是社会现象,需要不断创造。人的一生“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会“毫不为奇的过去”,但不能“奇想天开”,人老了还想“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教少年驼着吃苦”。^[45]鲁迅相信生命始终是进步的,乐观的。虽然“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因为“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社会人生多有“不调和”,少不了“萎缩堕落退步”,但是“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是“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但人类却总是拥有无尽的希望,“渴仰完全”,总是会

“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人类的生命“不怕死”,在死亡面前,它总是“笑着跳着”,跨过死亡“向前进”。并且,人类也“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46]这就是鲁迅的人生哲学,一种不怕死,积极乐观而向上的精神。另外,在鲁迅那里,即使生命处在沙漠里,也要做一个行走的歌者,“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是的,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沉重的沙”。即使没有生命的“竖琴”,也要唱出自己的“反抗之歌”。^[47]这就有点《野草》里“过客”的味道了。可以说,《热风》也有鲁迅的生命哲学,它与《野草》也是相通的。只不过,《野草》是以繁复的意象,跳跃的情绪,以及梦幻的象征建构了鲁迅的生存哲学,呈现了鲁迅内心的紧张和压抑,彰显了人生的绝望与抗争,而成为20世纪中国最有诗意的哲学和最富哲理的散文的完美结晶。《热风》也有《野草》的影子,是写作《野草》的思想铺垫和现实材料。作为思想者的鲁迅,他批判的锋芒并不停留在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有现实的鲜活与质感,始终渗透了思想的穿透力。《热风》也是其例证之一。

在文体上,《热风》还有开创者的贡献。《新青年》从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起,就开始以“随感录”为总题刊载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起初,它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列出单独的篇名,从第56篇开始在总题之下署上各篇题目。从1918年9月第5卷第3号《随感录·二十五》,到1919年11月第6卷第6号《六十六·生命的路》,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上共发表短评27篇,全都收入了《热风》。鲁迅自己这样描述这些“随感”：“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48]他交代了《热风》的写作背景,

都是有感而发,并非无故呻吟,只是鲁迅并没有选取当时社会上发生的所谓大事,而从具体细微的生活小事入手,从一滴海水里尝出盐味来,以小见大,冷嘲热讽,针砭时弊,纵横天下,这也正是“随感录”的文体特点。它体裁短小,文白夹杂,行文自如,有现实质感,经五四时期鲁迅和同时代的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一起苦心经营,砥砺切磋,最后发展成为特色鲜明的散文文体,并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挣得异彩纷呈的地位。《热风》既是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记录,也是《新青年》生存处境的呈现。它表明鲁迅已从新文化运动边缘走向了运动中心,并深度融入其中,特别是为思想启蒙提供了新旧杂陈的社会真相和循环守旧的人生发现。相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出白话文改良,陈独秀呼唤民主科学,钱玄同吼出打倒孔家店,他们多游走于思想观念上,鲁迅则把思想的眼光转向社会现实,转向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并为新文化运动吹来了一股不乏寒意的“热风”。

注释:

[1][3][40][41][48]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308、307、307、308、307页。

[2][3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441页。

[4][6]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360-361页。

[5][12]鲁迅:《随感录·五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6、357-358页。

[7]鲁迅:《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2-353页。

[8][9]鲁迅:《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322页。

[10][11]鲁迅:《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3、323页。

[13]鲁迅:《随感录·三十七》,《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5-326页。

[14][15][21]鲁迅:《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4-335、334、334页。

[16][22]鲁迅:《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366页。

[17]鲁迅:《五十八·人心很古》,《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18][19][20][23][42]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327、327-328、328、329页。

[24]鲁迅:《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25][26][27][28][29]鲁迅:《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312、311、312、312页。

[30][31][32]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9、338、339页。

[33]鲁迅:《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

[34][35][37]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0、341、341页。

[36][45]鲁迅:《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5、354页。

[39]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9页。

[43]鲁迅:《六十二·恨恨而死》,《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8页。

[44]鲁迅:《六十四·有无相通》,《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2页。

[46]鲁迅:《六十六·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47]鲁迅:《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